

中国 工业化进程中的 对外贸易

周泽喜 胡金根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 的对外贸易

主 编 周泽喜 胡金根
作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为农 方向东 叶柏寿
李达章 陈 民 周泽喜
武士国 胡金根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第098号

责任编辑：郭爱东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对外贸易

周泽喜 胡金根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0625印张 177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ISBN7-80070-084-4/F·81

定价：4.7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格局

- 第一节 出口贸易..... (14)
 - 第二节 进口贸易..... (25)
 - 第三节 我国外贸进出口发展的综合评介..... (33)
-

第三章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

- 第一节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外贸体制..... (41)
 - 第二节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 (45)
 - 第三节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思考..... (67)
-

第四章 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及其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90年代国际贸易环境的几个特点..... (75)
 - 第二节 90年代国际贸易格局、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 (84)
 - 第三节 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93)
-

第五章 亚太地区经济及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我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 (106)

第二节	亚太地区经济格局的形成及其影响	(111)
-----	-----------------------	---------

第六章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宏观因素分析

第一节	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126)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140)
第三节	经济运行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156)

第七章 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选择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主要外贸战略模式的分析	(171)
第二节	中国传统外贸发展战略的简单回顾与反思	(181)
第三节	中国外贸战略模式的选择与构想	(189)

第八章 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我国新的外贸发展战略的全面顺利实施

后 记

第一章

导 论

发展，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性的第一大课题，尤其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包涵着十分庞杂的内容，如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而18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全面大发展的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发展的中心内容是工业化。虽然各国工业化进程的模式、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工业化却是任何国家经济成长过程中都必然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任何国家由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一个必然选择。如果进一步分析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实践，可以看到，外贸在工业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各国都无一例外地把对外贸易的发展同实现工业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外贸易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尤其在当今开放的世界潮流中，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寻求到一条最适宜的贸易发展战略和在此基础上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必然延缓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水平的提高，阻碍工业化进程，延缓经济成长中的工业化历史阶段。因此，工业化和对外贸易问题的不可分割性是历史和现实决定的。

纵观我国建国以后经济发展以及结构变革，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工业化这个主轴展开和前进的。然而，剖析我国工业化进程，外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受限制的，它仅仅起到一个拾遗补缺的作用。虽然外贸在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外贸运行游离其外，外贸处于一种从属的地

位。

我国在建国后，经过短短的三年恢复时期，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然而，我国工业化进程和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如果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左右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起步的标志，那么，我国工业化起点则是相当低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开始工业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分别达到227美元、242美元、302美元、472美元（按1965年美元计算），而我国在工业化起步之初的195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美元，大大低于上述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当时的印度（1950年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0美元）。可见，建国后我国面临的工业化任务是极其繁重的。

按照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工业化的起步大都选择的是通过需求引导供给、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起步方式；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中心转向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而走向高加工度化、技术密集化。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资金、技术、市场等问题，同时也就意味着工业化起步阶段将持续较长时间。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是否都要亦步亦趋重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呢？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开辟了另外一条工业化道路。我国深受其影响，也选择了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起步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目的在于迅速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工业化启动阶段是较为顺利的，“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25亿美元的“156”项大型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起点低而积累不足的矛盾。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现，采取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在体制上，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中的人财物、产供销集中由中央主管部门调配，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在结构上，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实行重工业倾斜，重工业自我循环、自我服务，工业粗放型发展；在积累方式上，实行强制性积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把农业中的资金强制地转移为工业化积累，同时压低消费，实行低工资制；排斥市场机制，实行统购统销，扭曲要素价格。经济上高度封闭，不仅对外贸的依赖性很小，而且国内市场发育也被压抑，流通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城乡经济处于隔绝状态，限制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这种方式造成重工业畸型发展，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农轻重的比例失调，从而使工业化起步阶段大大延长。实际上，我国工业化在刚刚顺利走完启动阶段之后，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到80年代初期，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基本独立完整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几乎与此同时，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却已无法维持。

传统工业化战略受阻的关键性原因，从其表现形式来看，在于农业积累及低消费的贡献已无法支撑进一步的工业化。我国依靠强制地从农业及国民的低消费中获取资金，从而转移为工业化（重工业）积累，这种方式在工业化初期，确实起到了加速作用，但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和低消费这个积累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单纯地从农业提取积累和强迫农村劳动力滞留，保持重工业的自我循环，割断了生产要素流动的内在联系，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及转移受阻，农业生产率无法得到提高，农业份额相对下降的规律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无法发挥出来，而整个重工业却又处在自我服务和循环的封闭状态，庞大的工业体系仍然无法依靠自身的积累取得高速发展，仍然需要源源不断的从农业中抽取资金。长期从农业中过度提取资金积累，超过了农业承受能力，从而破坏了农业发展的基础。也破坏了工业存量要素所赖以生存的基础，进一步的工业化就难以为继了。

而从更为深层的角度分析，是否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必然积弊深重而难以有效克服呢？国际经验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延长工业化起步阶段，其关键原因在于他们形

成了工业化过程的最优经济流程，把工业化战略目标内化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机制，把本国工业化溶合于国际经济运行中。苏联在工业化起步时期尤其注意与东欧各国的贸易关系，其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及制成品的相当数量是从东欧各国进口的，同时，它的工业产品也向这些国家输散。日本更是把工业品的销售瞄向海外市场，在二次大战后，明确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系于国际经济大环境中，从而克服了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和资本短缺的困难，正是对外贸易支撑和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而我国前30年的工业化，在实行传统战略、传统体制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加上大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特点，使得我国未能寻求适当的外贸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闭关自守的发展方式使外贸只能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对外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一直不足10%；另一方面，满足高速度增长目标所需要的技术基础又必须依赖于外部，由于封闭体制排斥外部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只能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先进的技术装备。为进而出，量入为出，或者说以进口规模强制出口，就成为这一时期外贸的动因，对外贸易仅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我国工业化游离于国际经济之外。正是这种差异，使我国工业化明显慢于那些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国家，从而延缓了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

1979年以来的十多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我国工业化发生了质的变化。80年代初期，我国毅然摒弃了前30年传统封闭的工业化战略思想和体制，开始实施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开放型工业化发展战略，重视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对外贸易的作用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前30年工业化成就得到了巩固，并重新启动了工业化进程。

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将是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在对未来发展进行战略抉择之前，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判断我国工业化目前所处的阶段，确立下一步工业化的目标。根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测算，我国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为75.7：2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比重的74%，城市人口为25%^①。从产值结构可以判断，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却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按一般国际标准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工业化初期为300美元左右，工业化中期为300—2000美元，工业化后期为2000—3000美元。对我国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有多种判断，但总的来看是在500美元左右，处在准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成长阶段）的标准范围之内，离2000美元的分界点还相距较远。因此，综合以上指标及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初期任务——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正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我国国情和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推进工业化历程来看，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任务同样是繁重和艰巨的，道路也将更为漫长。根据工业化进程演变规律并综合不同国家工业化的实践，尤其是通过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国家的截面分析，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已具备了可能，并进入“高增长→高国民收入→高积累→更高增长”的良性循环。具体来说，由于工业已经形成了自我发展能力和调节机制，工业的扩张由依靠农业转向依靠自身的积累，工业迅速发展；结构转换的速度加快并逐步高度化，出口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形成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现代工业占主要地位；人均收入上升较快。我们认为，我国工业化中期的任务应当是充分具备上述特征，为此必须以持续、

① 数字来源冯海发、李微：《试论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业关系》《经济研究》1989年第12期。

稳定的较高经济增长速度，适应并推动经济结构的高转换率和结构升级，需要达到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为80：20，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0%，城市人口率为5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美元。

我国工业化中期的任务是繁重的，与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相比，道路更为艰巨。这主要是由于农业、能源、交通及原材料等产业长期缓慢增长，已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而前期工业化又未形成并留下合理、优化的经济发展流程；产业结构高度偏离，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工业高度结构大跨度错位^①。以上积弊和障碍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后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有种种显露。

在1979年我国工业化战略刚刚转轨时，就遇到了高度强化的二元结构矛盾的制约。一方面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比较大，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另一方面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国内巨大的温饱型市场无法得以满足。正是在这种结构性矛盾中，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首先是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配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手段，结果是不同凡响和出乎意料的，即农业持续几年的丰收和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和带动了潜力巨大但长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实现了1979—1984年“主要来自国民经济原有体制累积起来的经济潜力的释放”^②的经济增长，这时期农业平均每年以9.4%的超常规速度增长，轻工业也获得了

① 参见熊映梧、吴国华等：《论产业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

② 参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较快发展，轻工纺织等一般消费品产业平均每年以11.7%的速度增长。从而轮动了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工业化发展模式，也正是在此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即由传统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资源引导供给进而启动需求的发展模式，开始转变为以满足需求为主导，通过需求引导供给的发展模式。

然而，潜能释放型经济增长并不能维持太久。首先从产业发展和结构转换过程反映出来。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只是把传统工业化表层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而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未得到根治的疾患又萌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二元化结构冲突加剧。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进程来看，我国结构转换的速度将加快，下一步目标是结构逐步走向高度化，向产业结构高级化迈进，这也就意味着要求加强资金密集型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加工工业建设，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才能得以实现；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在获得农业丰收和农业超常规增长的同时，也解脱了长期对农业劳动力的束缚，压抑已久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急待转向非农领域，开始了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但也从客观上给进一步工业化发展带来了困难，其核心是也需要大量资金加以武装^①。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在积累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出现了相互争夺资金的矛盾。其次，从消费和市场特征的反映来看，初级农产品的超常规增长和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主体的工业增长也不能长久沿续。巨大的生产潜能和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中低档主导产品市场相对迅速趋于饱和，在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

① 参见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副题《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

巨大的需求，但业已丧失其主导地位，继续扩大初级农产品和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已无法再对国民经济增长起重要推动作用。消费需求的偏好和低水平经济景气过后，开始转向新的主导产品，这些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十分明显，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阶段，在温饱有余的基础上，新的消费特征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出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①。而我国经济的供求体系也就出现了明显的“断裂”现象。一方面，在国内产业结构中处于长线地位的中低档产品加工产业和不断进入的劳动力特别是从农村中游离出的劳动力，组合在一起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市场，但国内市场已经出现了饱和的迹象；另一方面，需求偏好的产品恰恰是缺乏国内技术贮备的新型产品和即使国内有生产能力，但还不能满足工业化加速之后巨大需求的基础产品^②。以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然面临的矛盾，在低水平经济繁荣之后仍然无法避免这些问题。

1984年以来我国推行的倾斜性产业政策，实际上采取了新工业倾斜。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高技术耐用消费品产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反映着轻型产业正在升级，产业结构进一步走向轻型化。而在收入政策上，同时出现了新的城市倾斜，消费需求更加旺盛。这样，倾斜性发展政策的实施与上面所分析的争夺资金、供求结构性偏差的矛盾，迫切需要推出新型的外贸政策与之配套，拾遗补缺型国际贸易发展政策，已无法适应新型开放的工业化要求。正是出于这种背景，工业化发展道路和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增

①② 参见刘鹤：《改革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9期。

长，毫无选择地把国际贸易推到了前台，抛弃了对外贸易过去那种拾遗补缺的从属角色。这也是工业化进程转变中，以满足需求为主导，通过需求引导供给发展模式的必然。

轻型化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以及外贸政策的作用，推动了我国后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但同时又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后果，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工业的进一步倾斜，也就意味着对农业采取新的歧视，这与我国目前工业化阶段中，工农业关系有序变化的一般规律相违背，从而既对农业的增长形成了障碍，又不利于工业的健康扩展。1984年以后，我国农业生产实际上一直处于徘徊、萎缩状态，特别是粮食、棉花曾经连续几年徘徊不前，致使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传统产业有相当部分的生产能力闲置；而加工工业的迅猛扩张，又加大了对农业的压力，使工农业在增长速度上重新出现了不合理的格局，整个经济难以保持适度增长。二是产业结构轻型化扩张，超出了基础产业的承受能力。虽然这一时期国家对基础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对基础产业供给缺口一补再补，煤炭、电力等的高增长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但是基础工业的增长仍然无法满足膨胀起来的加工工业需要，1984—1988年，采掘工业平均每年增长7%，原材料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1.4%，制造业平均每年增长17.8%，出现了增长速度上的“倒宝塔”格局，致使引进的大量轻型产业只能依赖进口原材料、原器件、零部件维持生产。三是经济增长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出口仍具有强制性；国际收支状况一度恶化；国家外汇严重短缺，技术引进受到制约，对产业结构优化支持不力。这也是经济发展中最综合、最严重的问题。1984—1988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过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高达10.7%，工业更是以“超高速”增长，这时期平均每年增长17.8%（其中，1985年高达21.4%，1988年高达20.8%），与此同时，外贸更热，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7个百

分点，高达17.7%（其中1985、1988年分别增长30%、24.4%），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16.1%，而进口额平均每年增长19.2%（其中1985、1988年分别增长54.1%、27.9%）。由于外贸以异常高的速度增长，因而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提高得较快，1984年为16%，而1987年已占到22.4%，1988年为21.3%。1988年出口依存度为12.6%，而进口依存度更高，为14.7%，这不仅高于同类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在这样高的进口依赖中，虽然包括了不应该大量进口的部分消费品，然而，即使把这部分剔除，进口依赖程度仍然不低。1985年以来，工业制成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保持在80%以上，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有较大比重，从而可以得出，我国工业增长对进口的依赖程度甚至更高。过高的进口依赖度固然可以对工业增长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会引起外汇收支平衡的紧张，1984年以后，我国曾连续出现了五年的外贸逆差。外汇短缺又成为开放经济中至关重要的新问题、新矛盾。

事实上，在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对外贸易在实现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已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的为进而出、量入为出的指导思想已被摒弃，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型外贸发展战略正逐步形成。然而，进出口动因转变的不同步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这种不同步具体地表现为，在进口动因方面，虽然进口总额和方向仍然由计划指导，但进口的冲动已不再是纯粹由政府“赶超”意愿引起的，而是产生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客观需要和各个利益主体的直接愿望；而出口动因方面，虽然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的自愿出口已有所形成，但传统的强制性出口的特征得以延续，在结构变革加速的1985年，为进而出的强迫性贸易动因，把初级产品出口的份额推到了顶点。而经济运行中，强制性出口却又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国内经济运

行和国内产业结构的正常转换逼迫必须出口，并要求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强制性出口又由于结构低级化(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受到国内财力和物力的制约。初级产品出口既是在汇率高估和国际“卖方市场”的情况下，需要巨额财政补贴的背景下进行的，又是在国内对初级产品需求旺盛条件下扩大的。这必然难以为继。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随着总量失控和结构性短缺加剧，通货膨胀日益加重，财政赤字支持国内短线物资出口的结果是进一步拉动了国内物价上涨，引起国内经济运行的不稳定。

国内经济的这种背景，以及经济运行中贸易功能和动因特征的这种变化，进一步把外贸问题，以及外贸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功能，推到了整个经济运行焦点的位置。同时，在前几年对外开放提供的丰富实践和经验基础上，于1987年下半年，理论界和决策层推出了具有战略性、高层次的理论和决策——国际大循环理论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国际大循环理论和沿海发展战略，就是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要求沿海地区不失时机地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其核心是发展出口贸易，围绕扩大出口创汇能力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以此带动全国经济更加迅速的发展，这也就使我国经济的运行与国际经济的运行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加速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国际大循环理论，尤其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说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已走向更为开放的政策和道路，提供了我国进一步工业化强大的动力，其中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愿望并不能代表现实，我国沿海地区自身的能力和世界经济环境所提供的机会与条件，成为国际大循环和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能否得以成功的关键。事实上，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从这几年实践来看，我们至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单一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难以解决工业化两大目标间的矛盾，而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困难重重。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

乡村劳动力的转移将主要通过以发展乡镇企业的形式来就地转化，而完全依靠这种乡镇企业来扩大出口，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何况劳动密集型产品多为国际贸易中的敏感商品，受出口配额的限制，竞争异常激烈。第二，我国是一个大国，日本和“四小龙”等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的海岛型经济的成功经验，难以在当今中国再现。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其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或主要地依赖于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将更为重要。而且，沿海地区经济与内地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地区分割性的战略必然产生巨大的地区矛盾。第三，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处于持续低速增长时期，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如果这个时候将市场完全放在国外，势必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势必面临着西方世界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沉重压力。第四，中国在上真正拥有的优势只有市场，而劳动力工资低廉基本上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优势，并非中国所特有，所谓的国际比较优势是指宏观层次上产业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这样，在宏观的国际比较优势相近的情况下，起主导作用的将是微观的国际竞争优势，即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如规模经济、产品质量、销售技术、国际声誉等。如果我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而国内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获得的国际市场只能是通过垂直分工而实现的低档产品市场。

总之，我国外贸发展格局，以及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是严峻、复杂的，我国工业化发展迫切需要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道路。事实上，开放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发展型式和道路，目前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进行努力探索。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工业化所采取的基本外贸战略大致可分为两类：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替代战略。这两种战略都有明显的优点，但从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效果来看，同时又都不尽如人意。从目前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其工业化，